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解读苏南

温铁军
等著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解读苏南

温铁军
等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读苏南/温铁军等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1. 4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ISBN 978-7-81137-650-0

I. ①解… II. ①温…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苏南地区 IV. ①F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4699 号



著 者 温铁军 等
策 划 沈海牧 陈兴昌 陈长荣
责任编辑 沈海牧 陈兴昌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 编 215006
电 话 0512-65225020 65222617(传真)
网 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张 22 插页 4 字数 403 千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65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一

苏南地区历来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之一,关于苏南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的活跃话题。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苏南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还是新世纪以来苏南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也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温铁军带领的研究团队花了四年功夫数易其稿完成的这本书,书名是“解读苏南”。我觉得,以他几十年的学问功底和近几年组织科研力量对苏南发展经验的跟踪研究,必是要在苏南研究中锦上添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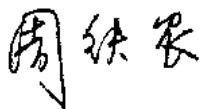
中国人都知道“三南”——苏南(苏锡常)、浙南(温台二州)、岭南(珠三角)——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区域,并且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苏南自清末开始就是中国加工制造产业布局的重点,浙南是个体私营经济按产业规律聚合而成的块状经济典型;而岭南经济发展则主要靠“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带动。温铁军借此书提出讨论的问题是:新世纪加入全球化以来,似乎苏南在向岭南靠拢,在发展模式上“殊途同归”地从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贸易演化成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而唯独浙南这个号称中国最具市场经济特征的地区,在全球化大潮下至今仍然很少有外资进入。对于这些趋同和趋异,如何进行合乎经验逻辑的理论解释,仍然是个重大挑战。我认为,这种“问题意识”清晰的区域比较研究,对于中国缩小区域差别、促进统筹协调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开展“解读”苏南的研究期间,温铁军带领的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关于岭南的区域发展研究且已付梓;除这本《解读苏南》以外,他还正在筹划对浙南经验的比较研究。我很期待他能推出中国经验的区域研究系列。因为,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大陆国家,了解中国各地不同的发展历程,是理解所谓“中国经验”的基础。这也有利于

构建中国在文化软实力上的国际话语权。

总之,事物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包括学者们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寻求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解读。一个好的研究课题可以从多方面启发人们的理性思考,最终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从这个角度说,此书值得一读。

是为序。



2010年12月

序言二

铁军写就《解读苏南》，嘱我代写序言，我自当遵命。

铁军自1987年4月起参与了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一直到1998年，长达11年之久。当时的农村改革试验区覆盖了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164个市(地、县)和约8000万农民群众，其覆盖区域之广，涉及人员之多，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试验内容之丰富，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中国农村改革的风云人物，如段应碧、陈锡文、杜鹰、卢迈、周其仁等，都对农村改革试验区倾注过大量心血。铁军有幸，目睹、亲身体验和参与了试验区最辉煌阶段的活动。他自己说，他是试验区的操作员和实验员，如同烧锅炉的，知道了这水是90度的，还是95度的，这个地方沸点是多少度。可以说，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智慧及创新精神滋养了他，他的试验区经历是他灵感的源泉，学术观点的底蕴，学术成就的奠基石。我也是在去试验区学习、调查和研讨的过程中，与铁军相知、相识，成为了朋友的。

铁军十几年农村改革试验区“操作员”的经历，使他对农村改革现实的复杂性、重点和难点深有体会。同时，他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具有高屋建瓴、纵横捭阖的宏观视野。最近一些年，他周游列国，把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比较，研究又拓展了国际视野。铁军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的是新闻，一个人第一专业的背景往往会给其一生的学术经历打上烙印。他由于学新闻出身，思维活跃，思想火花经常窜出来，常能想别人之未想，常发振聋发聩之言。他的思路有一条清晰的逻辑轨迹，只不过由于思想跳跃性强，中间可能有一些断点，用的学术语言又有些艰深，像我这样的驽钝之人不是马上就能理解的。尽管不能一下子读懂，但读他的文章能启迪人的思考，像吃橄榄一样，要慢慢品味、咀嚼、消化，一旦有些许领悟，则大喜过望。近些

年来,铁军的功力渐进,如同排球的小球串连技术一样日臻纯熟,他的思维也将断点串连起来,愈发显得缜密和连贯。

铁军的新书名为“解读苏南”,这也是他建立在试验区工作和此后多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探索。书中闪耀的一些思想观点我需慢慢领会,现仅就我目前粗浅的认识尝试着对铁军的书稿做一个解读。首先试图梳理作者写作的思路,再谈我自己的学习体会。

作者提出解读苏南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产业资本为什么在苏南积聚,特别是改革初期苏南社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及其对制度形成的决定作用。他认为,这种原始积累之所以能形成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劳动者的劳动贡献是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二是区位优势使苏南有可能将资源形态的农业土地转变为资产形态的工业用地,有机会承接城市的工业布局对外扩散转移的产业或环节,形成苏南乡村早期的工业结构。三是基于乡土社会道德文化的社区精英领导。他认为,只有立足乡土社会传统的良绅文化,才能在工业扩散转移时将土地资源资本化和将劳动力资源转化为资本。四是与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相对应的资本收益在村社区内部的公平分配。

作者在分析这个机制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希望引起讨论,即苏南工业化社区的内部分配,相当于恰亚诺夫假说分析到的家庭内部分配。他称之为村社理性的内部化机制,村内工农业劳动力都靠分配内部化的工分,年底才结算;乃至后来虽然实行工资制,也可以让绿色车间的农民拿工资,下田干活还保证其收入不低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高于进工厂车间干活的劳动力,这才维系了苏南的农业,保证了村民农产品的供给和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

如果用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来解释,也可以看到家庭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工业化村社范围的放大。与家庭同样,社区资源也在社区内部得到了相对合理的配置。比如,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中年妇女基本上养猪种菜,20岁左右的劳动力基本上进厂务工,而沿江、沿路的土地资本化开发——整体上村社内部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配置相对合理。

村社区内部的公平分配机制也可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组织本身就是反市场的结果——以村社为单位的组织如同企业一样把市场关系内部化,这样才能减少交易成本,才能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处理。

作者分析了苏南早期原始积累形成的乡村工业化制度,认为乡土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的“工业化社区”是中国经验的一个核心机制。他由此提炼出的第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苏南经验体现了原始积累阶段的市场关系在农村社区的内部化。

作者提炼出的第二个重要理论观点是,苏南经验属于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类型。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财政甩包袱的所谓改革,放弃了中央财政统收统支,提出“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就形成了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内在利益动机。真正在市场上扮演竞争主体地位的是政府,作为内因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加上市场经济外因形成的恶性竞争中,政府扮演了多重角色,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兼顾社会事业、医疗、教育。既然经济是政府搞的,那么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的收益就是政府的。于是,政府不仅直接占有企业收益,甚至直接剥夺企业资产的行政干预行为比比皆是,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地方治理结构,政府对公司治理有极大的发言权。每个乡镇工业公司之中的政府作用很大,一般是乡镇党委书记任董事长,几乎就相当于乡镇党委直接管理,统一调度一个地方的资源:劳动力、土地等。苏南乡镇企业的各级干部那时候都是由政府任命的。村一级企业是社区党政负责人与工业公司负责人身份合一、合署办公体制,在乡镇一级,企业治理由乡镇政府承担。

不过,上上下下占有企业资产和收益的问题,在乡镇企业发展比较快的时候矛盾并不明显。可是,到了经济危机阶段,矛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作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苏南私有化改制的根本原因是:在政府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经济主体,以政府公司主义行为,既造成了乡镇企业可以短时期内快速发展的成就,又造成了政府直接参与治理、直接获得乡镇企业的资源用于政府消费的成本。当发展顺利的时候,矛盾还能掩盖起来;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乡镇企业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据此,作者提出了第三个重要判断,如何重新解读乡镇企业改制?他认为,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形成制度变迁的交易过程,恰恰是政府和高负债企业之间的交易,是政府从一般企业中退出的过程。苏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面积改制,恰恰是一个苏南乡镇企业多重博弈的结果。

作者的第四个重要观点是,乡镇企业调整和产业结构提升与外资大规模进入同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与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金融资本逐渐形成严重过剩是值得重视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也要注意,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之后,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增加,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也必然增加。在上述背景下,苏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两件大事:一是乡镇企业改制,另一件是带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意义的外资开始成规模进入,这就是新加坡工业园和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

苏南过去是强政府,现在仍然是强政府。

进入 21 世纪,是国际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主导竞争的时代。政府公司主义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现在迅速“进步”,开始玩资本游戏。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落户江苏,主要进入强政府控制的上海和苏南?因为外资和上海、苏南这种强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最低;以获得超额利润为目标的垄断资本之间最容易达成有利于双方的契约关系,而中国垄断资本其实就是实行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的政府资本。为什么从 80 年代直到 90 年代后期外资(不同于早期的港澳华人中小企业资本)基本上不进入中国自由资本主义最发达、自由市场制度最好的浙南、岭南(广东珠江三角洲)?因为那里是成千上万的小经济,交易成本太高。

苏南之所以会在外资进入规模上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地区,与苏南属于强政府经济——政府主导当地的土地和资金等要素配置——是高度相关的。

不过,作者没有以引进外资多少论成败,而是进一步对苏南与岭南“殊途同归”的现象作分析,指出中国于新世纪挟带自身严重的产业过剩加入全球化,促使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导致外资大举进入沿海之后,苏南也从以内需为主向珠江三角洲的加工贸易型经济的转变。这才是更值得学者深思的。

最后,如何归纳和概括铁军在这本书中体现的思想?苏南经验被作者去意识形态化地解读出的核心结论只有一条:追求产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地方政府内生性地发生公司化演变,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在随后顺势发生的适应产业资本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需求的市场化改制条件下主导了一系列制度变迁。

作者提出的历史性判断是:20 世纪的中国发展,其实是在本质上属于在政府公司主义的体制安排下,数亿原住民人口完成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而中国人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里,完成的是金融资本异化于全面过剩的产业资本并走向自身相对过剩的历史进程。

以上是我对铁军在本书中思想轨迹的梳理。下面再谈谈我个人粗浅的学习体会。

中国农村工业化进程的鲜明特征是地方政府领办或倡导办乡村集体企业。这种企业具有两个鲜明的特性:第一是社区性,企业并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而是既要追求利润,又要安排本社区剩余劳动力就业,为本社区居民提供福利。第二是行政依附性,乡镇政府和村领导要控制企业,管理企业。国外一些学者将乡镇企业的成功归之于这种模式,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他们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将其行政范围内的企业视为一个大公司整体

的一部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同公司内部的关系,地方政府充当的是董事会的角色,而政府的干预对企业的成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①。国内有的研究者也认为,农村社区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全排他性产权”现阶段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农村社区经济的现实。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这种模式的产生有其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在财政体制改革中,由于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滞后及多渠道的政府预算,地方政府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往往是“吃饭财政”,一些地方连行政事业费、人头费等项开支也难以保证,更无法正常履行政府职能,造成财权与事权的分离。为了正常运转,履行职能,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掌握和扩大地方能自由支配的收入,各级地方政府只好从制度外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及各级政府的自筹资金收入)想办法。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办工业企业的上缴利润则成为制度外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是地方政府办乡镇企业的直接动因。

铁军在他的书稿中对此从宏观角度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中最具有政府公司化意义、最具有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本干预分配色彩的典型地区,就是苏南。他还从国际视角出发,指出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制度体系本源于二战后因朝鲜半岛战争改变冷战时期东亚地缘战略格局而相应演化出的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

在评价地方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应以今日之“是”来评昨日之“非”,而应客观地分析昨日之“非”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根源。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市场秩序尚不完善,在与外界的工商、税务、交通监理、环保等政府部门打交道时,由地方政府或社区组织出面要比由企业出面好得多,政府或村集体还可出面为企业从银行或信用社获取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具有寻求政府及社区保护的内在需求,借以节约企业的外部交易费用。世界银行在一份关于我国乡镇企业的考察报告中曾指出,乡镇企业在资金借贷、市场进入等方面,面临不良的环境条件,而政企不分恰是企业对付这样不良环境的最明智的选择。同时,由于乡镇集体企业的上缴利润是地方政府自筹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村办集体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村社区组织行政职能的经济基础,因而这两级领导在干预企业活动时尽管有失误,但还能避免短期行为及防止资产的流失,这也就是当年乡村集体企业虽然产权不清晰但仍有效

^① Jean C. Oi.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The Organization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Ch. 4, Chinese Rural Industry Takes Off: Incentives for Growth.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率、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

但应指出,财权与事权相分离的扭曲的预算机制对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构成种种障碍,使乡镇政府及村社区组织在保护企业的同时,又要控制企业,向企业索取,这就使以下种种弊端凸显出来:第一,行政干预经济,盲目决策、瞎指挥使乡村集体企业效益下降,不良债务增多。第二,乡镇政府及各行业主管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收费,很多是属于没有财权为依托的社会性支出,这种非规范性的制度外财政收入随意性强,透明度低,缺乏有效的监督,易于引发腐败行为,群众反映的乡镇企业成为干部的“小金库”便是一例。第三,农村基层政府与乡镇集体企业之间直接的利益关系使得地方政府从各方面来保护企业,从而导致企业的种种有碍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为难以杜绝。乡镇企业到期不归还贷款和拖欠银行贷款利息等逃避银行债务的行径在很多情况下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为了保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地方政府有时亦放松对污染企业的监控,容忍企业将内部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从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至于假冒伪劣产品的屡禁不止更是与地方保护主义有直接关系。当控制的弊端产生的成本大于保护形成的收益时,改革也就不可避免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力推行的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引起不少争论。但有两点似乎可以确定,第一点,改革明晰了集体企业的产权,使这些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第二点,在乡村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进程中,以集体企业领导人为一方,面对的不是全乡镇或村的社区成员,而是乡村干部,是双方的一种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其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实力、谈判地位。在谈判过程中,名义上的所有者(社区农民)往往是被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的,最终的战利品也是在博弈的双方之间瓜分的。

在谈到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时,我还想强调的是,以苏南为代表的乡镇集体企业应更明确和具体地从乡镇一级集体企业和村一级集体企业两个层面来分析,前者往往受到县和乡镇地方政府的主导和控制,是典型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经济类型。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村社区领导人的主导和控制,可以说是“农村社区公司主义”(Rural Community Corporatism)。实际上,许多苏南的行政村已经演变为政企合一的集团公司。

如果说苏南的地方政府是强政府,那么苏南许多农村社区领导则是强人政治。

我不否认一些村社区精英(良绅)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公平正义,但我更愿意把他们看做理性的经济人。一些集体经济实力较强的村社区组织没有通过产权改革

实行资产量化,社区领导人虽然没有由此获得更多的剩余索取权,但他们实际上掌握着剩余控制权,并可通过第二代接班(禅让)的形式将这种控制权保持在自己家族手中。一旦这个链条断裂,他们必然要通过明晰产权的方式来争夺战利品,这就出现了前述的大部分所有者被排斥在外的博弈过程。

当前,以苏南为代表的地方强政府的局面发生变化没有?

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匮乏和掌控当地资源的权力并存^①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一方面,一部分地区地方政府财税收入的比重下降,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能力不足,目前地方政府近一半的财政支出依靠中央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②;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仍然拥有应该放弃的掌控资源的权力,前面提到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实际上依然存在,地方政府支配当地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济活动,掌握着当地资源,尤其是农村土地的控制权,从而主导和直接参与地方的经济事务。

未来这种强政府主导的局面将向何处去?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基本任务也从实现经济增长这个单一目标转为实现经济发展、保护产权、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等多重目标,这也就意味着政府的职能必须转变^③。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也就是权力不与资本结盟,而是从公正的角度,协调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政府角色,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扮演着经济型的政府。当前,中央提出建立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社会公正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这标志着政府职能定位的回归,也标志着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开始进入其终结阶段,但它的真正终结则有赖于深层次改革的整体推进。

乡村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之路已经尘埃落定。回顾苏南的产权改革,改制形成的初始产权构成是否合理,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多大程度上不合理;改制过程是否像当初有人所言是“权贵私有化”,是“本世纪最后一次大发横财的机会”;改制结果是否已出现有人担心的“以官商勾结为特征的寡头们对土地和资本要素的垄断,以及这些寡头企业族对大量中小个体劳动者的盘剥”这样一种现象?对于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有可能经过广泛、深入、全面的回顾和反思作出回答了。铁军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答了这些问题。

谈铁军的书,不可避免地也要谈铁军的活动。铁军的工作,长期以来一直与

① 参见许成钢,《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比较(36)》,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② 刘文海,《对政的“重心”要适当下移 政府花好财政钱》,人民日报,2008-09-24。

③ 参见许成钢,《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比较(36)》,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农”相伴，就任《中国改革》及《改革内参》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时，我们也有过一些交往与合作。2004年他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后，我们也还时有接触，知道他不仅做学问，带研究生，做行政管理，还将自己的理论观点践行于农村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之中，成立乡村建设学院，在各地做乡村建设试验，组织“大学生支农调研”，促成城市白领与农民合作社的对接……我惊叹于他精力之旺盛，工作之献身，但每隔一段时间见到他，总感到他身心略显疲惫，人也渐显苍老。我曾劝他，要悠着点，要张弛有度，一个人即使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呢？他总是说，做到这个份上，很难停步。然后，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他的学院和各项事业的发展，舔犊情深地历数他弟子的成就。我也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些各行各业的精英，往往是在透支生命，超负荷运转，但又欲罢不能，仿佛成了永动机。尽管如此，每当看到铁军渐多华发的鬓角，逐渐龙钟的身影，心中总有一番感慨，因为我曾见证过他云游四海、矫健飘逸的形象。

铁军自言：“越是广泛调研，越是更多地做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就越深感‘学然后知不足’的深刻意义；人也就逐渐变得‘平和’。”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铁军谦和笑容的背后，依旧是桀骜不驯、睥睨天下的“范儿”。这只有在他谈兴渐浓，从招牌式的谦和微笑转化为调侃式的坏笑时才会灵光一现。他在接受访谈时，总谈及自己与主流思想的不同，也许他在“三农”学界真的是一个“异类”。但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必然是允许以至鼓励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铁军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在转型中不断调整和纠错从而不断前进的时代，有幸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程度越来越高、包容性越来越强的社会，他的能量和热情有宣泄的渠道，他的聪明与才智有展现的平台，他的“非主流”的观点得以通过各种传媒以及他的弟子警示给世人，引起人们的思考。“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铁军正当盛年，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铁军，好自珍摄，珍摄！

张晓山

写于庚寅年底

提 要

拨去流光溢彩的浮幻,苏南经验被我们“去意识形态化”地解读出的核心结论是:追求产业资本发展的地方政府内生性地发生公司化演变,所导致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得以结合村社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问题的理性机制低成本地完成了地方工业化原始积累,并在随后顺势发生的适应产业资本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需求的市场化改制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主导了一系列制度变迁……

本书对苏南经验的综合分析,可以归纳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主义”,两个“理性”,三个“占有”,四个阶段。

一个“主义”——引领苏南地方工业化发展之最大经济主体是较早获得财税、外贸、金融等宏观经济权利的地方政府,体现为20世纪70—80年代出现且越来越强大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两个“理性”——除了以公司化的政府必然出于利益考量在经济领域直接行使“进入权和退出权”为特征的“政府理性”之外,分析整个苏南工业化原始积累没有西方那种暴力血腥,其产业扩张和改制也没有其他地区不断爆发的对抗性冲突的原因,在于得益于以土地和其他资产的村社共有财产关系为前提的、内在地具有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机制的“村社理性”。

三个“占有”——苏南地方工业化早期几乎没有个体投资人,而主要是村社集体通过直接占有本村的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村社成员福利分配,来完成以资源资本化为内涵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其后的以各种名义进行的产业资本扩张和制度变迁,仍然不是以个体投资人为主体,而内在的线索仍然是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的资

源资本化和村社成员福利分配问题。

四个阶段——苏南工业化进程可大致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以“村社理性”完成“原始积累”，二是以外向型演变来应对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约束，三是以产权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四是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转型而融入全球化。

由于借用来作为本书分析工具的“政府公司主义”概念，仍然是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地方发展经验的现象性归纳，更需要对于借概念而生发出来的理论创新多作些解释。

人们也许会依据中国发展的客观进程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处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判断。进而，也许据此会理解毛泽东 20 世纪 50 年代结合民族资本与国家资本互动发展及其相关制度演变而提出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邓小平 80 年代结合产业资本一经形成便会内生性地趋向于市场经济而继承性地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若然，可能会或多或少地逐渐认同作者在进入 2000 年后提出并不断充实的历史性判断：20 世纪的中国发展，其实是在本质上属于政府公司主义的体制安排下，数亿原住民人口完成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进入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而中国人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里，完成的是金融资本异化于全面过剩的产业资本并走向自身相对过剩的历史进程。

出于“去意识形态化”地归纳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发展的这种客观经验过程的需要，我们使用“政府公司主义”这个比较中性的概念也许更易于构建话语，形成理性的逻辑解释——因为这只是后发工业化国家一种有效地将可用社会资源迅速集聚于工业化积累的制度形式或手段——无论是新中国前 30 年的中央政府公司主义，还是 80 年代以来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如果换用制度经济学概念以言之，政府公司主义不过是因人口与资源关系过度紧张而衍生出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内向型的原始积累所派生出来的制度类型；并在原始积累之后必然发生的产业资本结构调整和产业扩张时期的制度变迁中导致的路径依赖。

这种政府公司主义发展经验在国际上并非完全没有可比性。比如，西方早期以国家政治军事手段推进殖民地开拓的重商主义和后期偏向于社会稳定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都客观上和政府高度介入乃至直接干预相关。

如果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中国经验确有质的不同，则在于早期西方崛起于欧洲半岛型的大陆边缘区（荷兰、西班牙、英国等相继崛起的海上霸权都不是欧陆中心国家）的重商主义伴随坚船利炮的野蛮征服，后起于欧陆中心地区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也是在继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国家主义崛起经验之后才逐渐演变而成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政府“有限介入”。而在亚洲,日本在明治维新确立军事立国方略之时即确立以德为师;帝制解体之际寻找出路的中国则在20世纪初也师从德、日,此后到20世纪中叶完成农民革命建立的政权虽曾一度师从苏联,但那也是政府直接扮演发展主体的角色……

总之,中国无论是早期的内向型原始积累还是后来的外向型招商引资,都属于发展产业资本的不同形式;内在不变的还是政府直接作为经济主体,以政府公司化的资源资本化发展模式来推动经济进程,并在政府直接干预的条件下对社会分享所有的可能收益——不仅是当期收益,还包括长远收益。

并且,中国的公司化的政府一旦直接使用市场手段与国家资本结合,几乎难以形成真正符合西方被盎格鲁—撒克逊主流话语体系所规范的市场体制。

无论是做发展经验归纳还是做模型研究,结果都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资本为主的制度变迁本身的外部性问题——在政府主导的差异化配置资本和分配收益的制度安排下,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在不同主体中的分配往往是不对称的;而这恰恰又是两极分化的重要制度性成因。

如果愿意参考上述高度概括的“宏大叙事”所揭示的历史进程,那么,苏南经验就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中国特色的发展经验中最具有政府公司化意义,最具有强政府直接配置资本、干预分配色彩的典型地区,就是苏南。不论是乡镇企业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还是新世纪以来招商引资的如火如荼,苏南的盛衰演替,都可大致归因于政府主导。

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者就发表了“危机论”来概述新中国1949年以后发生过的周期性经济危机。^①当90年代初期很多人还深陷于“意识形态化”的改革争论时,我们就已经在超越价值判断地去分析国家资本的运动特征了。^②在这次全面分析苏南经验的时候,我们试图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司主义制度体系本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朝鲜战争改变了冷战时期东亚地缘战略格局而相应演化出的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原始积累。

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完成之前,苏南地区尚没有条件产生地方政府公司主义体制;亦即,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地方政府在全国财政统收统支的体制约束下,还没有“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客观条件。当70年代中央政府掌控的长江

^① 温铁军. 危机论——从结构性危机向周期性危机的转化. 经济学周报, 1988-05-15; 转载于新华文摘, 1988(8); 收录于温铁军. 我们到底要什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② 温铁军. 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 发现, 1993年秋季号; 转载于新华文摘, 1993(12); 收录于温铁军. 我们到底要什么.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相对完整的城市产业带向农村要素低谷顺势扩张时,客观上也使政府公司主义的制度内核——政府直接推进资源资本化——向县域以下尤其是乡(镇)村的工业化原始积累延伸。所不同的,主要在于“村社理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因缺乏相应的要素配给政策而不得不内部化处理原始积累中必然遭遇的大量外部性问题。

苏南农村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如果仅限定为20世纪70—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所属社区对社区内部资源要素的自我剥夺过程,则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集体经济的制度经验在全国最显著地发生在辽东、胶东、苏南和浙北,而截然无法复制到岭南和浙南;更无法理解为什么苏南、浙南和岭南的产业形成、调整和扩张的路径会形成如此显著的差异。苏南的乡镇企业接受的是城市工业对它的扩散和整合,产业类别与城市同构;岭南则融入了港资企业产业链条中的加工环节,从而形成了“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基地;浙南则以当地内部自我整合产业链各环节并将收益内部化平均分配的“块状经济”为显著特征。正因为此,我们才要将考察范围扩展到城市的工业化原始积累。

这不仅是打开理解苏南之门的第一把钥匙,而且能够因把握了不同原始积累方式内生之不同制度必有的“路径依赖”,而顺理成章地解读其引起瓦釜雷鸣般街谈巷议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及后续改制之谜。

整个20世纪70年代,充满着乾坤幻化,斗转星移。其中,1971年是个标志性年份——中国这边厢刚刚完成国家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遂在1971年启动恢复对西方外交关系谈判的同时,开始进入大规模吸引西方资本调整本国军事与重化工业占比过大的产业结构的新时期;欧美那边厢已经到了以1971年美国单方面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标志的金融资本主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金融帝国主义阶段。

此后,一方面是中国在经济基础领域被西方资本促动的结构调整引发了本土上层建筑的严重不适,随后逐渐启动了“开放促改革”的制度演变;另一方面则是欧美、日产业资本更加大规模地对外转移。

诚然,这个经验过程无论是否被西方学者归类为“里根—撒切尔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历经两次大战连续获胜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进退裕如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都会为金融资本滥觞全球而变幻各种软硬工具;随之,在那早就被魂牵梦绕的现代化“苦恋”搞得半推半就的东欧和东亚大陆上,顺应西方经济向金融资本主导的结构升级必然连带发生产业资本大转移而兴起的激进制度变迁之风,势必